

圖說北京史



圖說北京史

ILLUSTRATING
BEIJING'S HISTORY

下 册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 SHAN PUBLISHING HOUSE

序

《图说北京史》即将付印出版，我作为该书初稿的一个读者感到十分高兴，这是北京史研究上的一件大事。

北京史虽然是中国的一部地方历史，但是，由于北京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特别是11世纪初辽定幽州为南京后，北京的历史便密切地与全国的历史相结合，北京成为近千年来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舞台，这恐怕没有第二个中国城市能够与北京相比。北京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之形成决非偶然，而是有它自身的历史条件和发展规律的。从50万年前的北京人开始，北京便以中国远古人类的故乡而闻名于世界，北京地处燕山南麓，西有太行，东濒渤海，是中原与北方草原和东北平原交通之咽喉，自一万年以来的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北京是中原和北方文化交汇融合的地带，这个形势一直延续到汉唐时期，北京既是中原王朝的重镇，又是北方各族人民贸易交流的中心，1956年北京八宝山发现的西晋永嘉元年(307)幽州刺史王浚妻华芳墓中出土了一件波斯萨珊玻璃碗，这是我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萨珊玻璃器，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中亚或西亚制作的镶宝石的掐丝胡伎银铃，说明4世纪初北京不但与北方有贸易文化交流，同时与中亚和西亚也有往来关系。唐代的幽州经济发达，这与隋开通南北大运河有密切之关系，房山云居寺唐代刻经题记中便记有三十余种手工业行业在那里刻经，这在全国都是罕见的。幽州经济的实力直接支持了改变唐代历史的“安史之乱”，这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影响。辽代的南京在唐幽州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成为辽代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近年的考古发现充分证明了这一点。1974年山西应县佛宫寺辽代木塔中发现辽末入藏的契丹藏和其它刻本书籍，都是刻于燕京的，1988年—1992年内蒙巴林右旗辽庆州白塔中发现的重熙十八年(1049)入藏的刻经和丝织品，也是燕京印造的。前几年发现的辽太平年间(1204—1208)供奉辽文忠王府大殿(文忠王即韩德让，后赐名耶律隆运，与辽景宗后萧绰私通，景宗死后，德让立圣宗耶律隆绪为帝，隆绪事德让如父。文忠王府大殿是专祀萧绰皇后的)的几十件带铭文的金银祭器，都是张俭和萧木哲在燕京制造的。凡此种种，皆证实辽之燕京是当时先进的南院统治区(即燕云十六州地区)的中心，是辽代政权的经济根本所在，所以，辽天祚帝自燕京败走后辽王朝也就灭亡了。北京成为全国都城之前，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已十分显著。

北京历史的核心是北京城的历史。北京最早的城是房山琉璃河董家林西周城址，燕上都很可能在今广安门内外一带，战国至汉代陶井圈和燕式鬲瓮

纹半瓦当的发现,说明这个区域自东周以来至金中都一直是北京古城之所在。今日北京城的前身是元大都,元大都是元朝结束南北分治、全国统一后新设计规划的都城,它废除了隋唐都城封闭式里坊制的规划,继承了北宋汴梁(今河南开封)的传统,是一种全新的开放式街巷制的规划。考古学的发现和研究表明,今人北京内城东西长安街以北至北城墙内的街道布局,基本上都是元大都街道的旧迹,也就是我们今天仍看得到的南北向大街两旁平行排列的等距离的东西向胡同的街道布局,以东西城垣上两城门之间,如东垣之朝阳门(元齐化门)至东直门(元崇仁门)之间来计算,平列胡同22条,胡同之间距77米。明清两代主要是改建宫城、皇城,对全城的街道规划未作改变。一个现代化的城市中尚保留着700年前城市规划的街道布局,这在世界上也是很少见的,何况完成于公元13世纪中叶的元大都城市规划是中国古代都城规划最后的经典之作。元大都也是当时世界上著名的大都会(汗八里),这样一座具有世界意义的大都会,街道遗迹尚保留在现代北京市之中心,是值得我们重视和骄傲的。在今后的北京市城市规划中,我们不仅要保护好世界文化遗产故宫和许多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要努力保护好700年前元大都的街道旧迹。

《图说北京史》的最大特点是以图(包括照片、拓片、测绘图等)为主,用图把历史形象化,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将是看得见、找得到的、很具体的北京历史。半个世纪前,我在燕京大学上学的时候,跟着我的北京史启蒙老师侯仁之先生学北京历史地理,侯先生从学校租上烧木炭的小汽车,载着我们去广安门外金中都宫殿遗址,捡回很多黄绿釉的建筑琉璃饰件,在遗址废墟上,我有很多浮想,其中之一便是希望历史能够形象化,这是我后来去学了考古的一个原因。但是,历史的形象化是很不容易的,首先是必须有足够的图像史料,这在很大程度上要靠考古学的新发现,经过半个世纪中国考古学界的努力,现在终于有了这个条件,这是《图说北京史》编辑出版的前提,也是北京地区考古学成果的充分反映。当然,考古学的新发现日新月异,过些年后,《图说北京史》会重新增订出版新的版本,这是学术发展的必然规律,但是,现在出版的第一版具有开创之功,尤其难能可贵。《图说北京史》还有一个“立此存照”的作用,书中所刊登的许多图片,特别是许多文物遗迹的现状照片,都是近年所摄,若干年后,人们可以此为据,检验这些文物遗迹保存的情况,这是把北京历史文物遗迹现状公之于众,交到社会上监督保护的好方式。

承《图说北京史》主编齐心先生和北京燕山出版社总编辑赵珩先生之邀,为书作序,因略述对《图说北京史》的几点读后感,恐不足以序也。

徐莘芳

1999年6月13日

第一章 契丹族源流、立国 与建都

第一节 契丹族的兴起

契丹这个在北方草原上纵横驰骋了600年的古老民族在公元10世纪终于迎来了他的黄金岁月。大契丹国——大辽政权的建立使这个至今已经消亡了的民族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不可磨灭的一页。

“契丹”一词最早见于《魏书》，这时的契丹族有八个部落游牧于潢河(今内蒙古西刺木伦河)、土

河(今老哈河流域，之后契丹族先后处于突厥、回纥的统治之下，并经高和北朝、隋、唐等中原王朝发生武装冲突。大贺氏、遥辇氏两个部落先后处于契丹族部落联盟首领地位，公元八世纪后期，迭剌部逐渐强大起来，处于契丹族部落联盟首领地位。同中原农耕文化接触较多，发展较快。耶律阿保机的祖父匀德实，父亲撒剌的，叔父释鲁先后出任迭剌部的夷离盖(军事首领)。耶律家族逐渐在迭剌部乃至遥辇氏部落联盟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耶律氏取代遥辇氏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

图一 青牛白马相遇图
关于契丹族的起源有这样一种传说：远古时有一个男子骑着白马沿土河而下，又有一个女子牵着青牛驾的车沿潢河而下，相遇于两河交汇的木叶山，在此结为夫妇，这就是契丹族的始祖，他们生了八个儿子，繁衍成为契丹八部落。



第二节 耶律阿保机称帝

公元907年，耶律阿保机利用强大的军事力量一举成为契丹族的最高首领。公元916年，阿保机在龙化州(今内蒙古赤峰市八仙筒一带)筑坛，登基即位。国号“契丹”，建元“神册”，自称“大圣大明天皇帝”，册妻述律氏为“应天大明地皇后”，立长子耶律倍为皇太子，确定了皇权世袭的统治，宣告了契丹部落联盟选举制的消亡和契丹王朝的诞生，耶律阿保机成为契丹国的第一位皇帝。契丹建国后，定都于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创制了契丹人、小字，结束了契丹民族无文字的历史，为契丹族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神册六年阿保机又下令制定了法律。一系列措施，使契丹国家已初具规模，从此契丹开始逐渐走向强盛。



图2 卓歇图



图3 末辽西夏形势图



图4 契丹文金牌
牌上文字为契丹小字，译为“鞍宜速”，是代
表皇权承办国家大事的信物。

第二章 行政区划、政权机构和城市布局

第一节 升幽州为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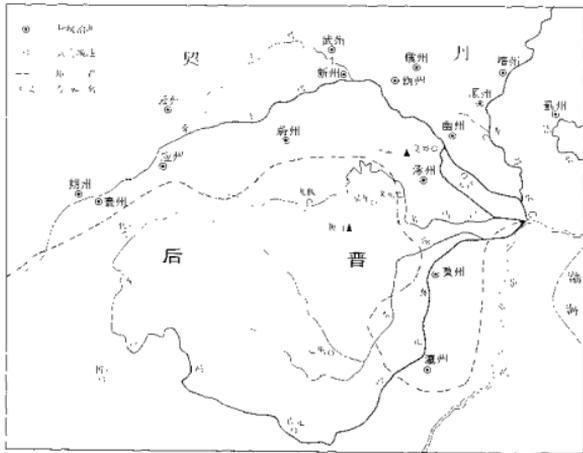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死后，其子耶律德光继位，是为太宗。辽太宗继续执行太祖的政策，不断南下叩打中原的门户，以图占据中原，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幽州城。

天显十一年(936)，后唐将领石敬瑭在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叛唐自立，并上表向辽太宗求援，甘愿称比自己小的太宗为父，许诺次后唐后向契丹纳土称臣。这样，耶律德光派兵南下，大败后唐军

于晋阳，十一月，册封石敬瑭为“大晋皇帝”，二人执手“约为父子”。之后，石敬瑭南下攻占洛阳，灭后唐。

石敬瑭当上“儿皇帝”之后，于会同元年(938)十一月，把燕云十六州之地割让给契丹。随即，太宗诏以京都为上京，改原南京(今辽宁辽阳)为东京，升幽州为南京(也称燕京)。此后，南京就成为辽五京之一(另二京为中京大定府、西京大同府)，北京从中原王朝的边疆重镇而一变成成为北方游牧民族王朝的陪都，拉开了北京成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序幕，揭开了它历史上崭新的一页。

图5 燕云十六州图 燕云十六州即唐今北京、幽州(今天津蓟县)、瀛州(今河北河间)、莫州(今河北任丘)、深州(今河北深州)、恒州(今北京密云)、顺州(今北京顺义)、妫州(今河北怀来)、新州(今河北徐水)、蔚州(今河北蔚县)、武州(今河北宣化)、云州(今山西大同)、应州(今山西应县)、朔州(今山西朔县)、代州(今山西代县)等州。



第二节 行政区划及机构设置

后改析津。南京析津府下直辖11县，还辖有6个刺史州，其下各设数量不等的县共计13个，如下表：

南京在辽代隶属于南京道，辽初府名为幽都。

南京行政区划表

南京析津府	直辖	析津县、宛平县、昌平县、潞县、良乡县、安次县、永清县、武清县、香河县、玉河县、涪阴县
	顺州	怀柔县
	檀州	密云县、行唐县
	涿州	范阳县、固安县、新城县、归义县
	易州	易县、涞水县、容城县
	蓟州	渔阳县、三河县、玉田县
	景州	



图6 辽析津府图

契丹在得到幽燕地区后，社会内部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契丹族当时的主要生产方式还是以畜牧与狩猎为主，而幽燕地区已具有高度发展的封建经济文化，过着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两者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有很大差异。针对此种情况，契丹统治者在国家管理上采取“胡汉分治”的办法，“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即中央统治机构分设北面官和南面官两大系统。北面官治理契丹人和其他游牧民族，而南面官则治理汉人和渤海人等农耕民族。南京的政权机构属南面官系统。南京的中央机构有宰相府，设左右相、左右平章事。地方机构有南京留守司，管理南京军政，其长官留守是南京的最高行政长官，一般同时又兼任析津府尹。留守司下设三司使司、转运使司、粟阿司等经济管理机构。另有虞候司负责皇帝巡幸南京时的警卫；警巡院负责治安。军事机构有南京统军司，长官为南京统军使，下属有马步兵指挥使，辖马军都指挥使司和步军都指挥使司。地方各州县的机构则一如中原王朝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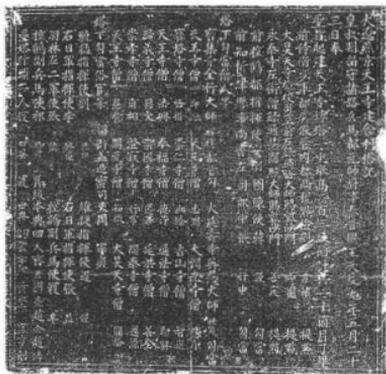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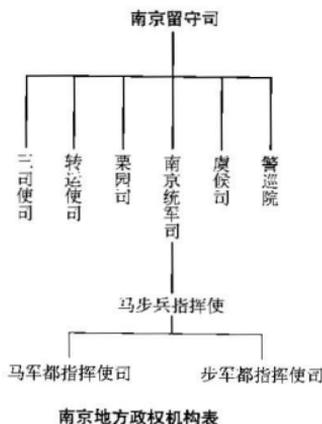


图7 天宁寺塔建塔碑拓片 此碑为1991—1992年维修天宁寺塔时，在塔刹座内发现的，为当时的南京留守耶律淳于天庆九年(1119)建塔时所立。

第三节 城市布局

南京城在辽五京中规模最大，位于今宣武区西南一带。基本沿用唐幽州城，只是把城墙重加修筑，并未进行大规模城市改造。其北城墙在白云观北侧东西一线；南城墙在白纸坊东、西街一线；东城墙在烂漫胡同与法源寺之间；西城墙在会城门至莲花河东岸。《辽史·地理志》载南京“城方三十六里，崇三丈，衢广一丈五尺”。有八个城门，四面各两个。东为安东、迎春；南为开阳、丹凤；西为显西、清晋；北为通天、拱辰。皇城即于城在南京城的西南隅，皇城的西、南墙实为南京城西、南墙的一部分。皇城有四门：宣和、丹凤、显西、子北。南京城内分布着居民居住的26坊，坊大多沿用唐代旧称，坊有围墙、坊门，门上有坊名。城北设有市。



图9 天宁寺塔 北京城区仅存的辽代建筑。密檐八角十三层，通高58.7米。在整体造型和局部手法上表现了辽代密檐砖塔的建筑风格，是研究中国古代佛塔的重要实例。同时该塔又是研究辽南京城址地理位置的重要依据。



第三章 宋与辽争夺燕京

辽取得燕云十六州之后，不仅获得了这十六州的土地人民、财政收入，更重要的是取得了对中原政权的战略主动地位。燕山等山脉的崇山峻岭不再成为契丹铁骑南下的屏障，而是成为其稳固的后方。华北大平原的门户顿开使中原政权几乎无险可守。因此，契丹建国后，连年南下，给中原政权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夺回燕云十六州成为中原政权的宿愿。于是在后周和北宋时期，就先后发动了三次攻打燕京的战争。中原政权与辽围绕以燕京为中心的燕云十六州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辽应历九年(959)四月，后周世宗决心一举收复燕云。战争开始后，后周军势如破竹，先后攻下或受降益津、瓦桥、淤口三关。辽战争失利的主要原因在于辽穆宗思想上的不重视，认为这些土地本来就是“汉地”，损失了也不是为惜。当周世宗下令进攻燕京时，穆宗在大臣萧思温的再三鼓动下到南京亲自督战，而在此时，周世宗却突发急病，只得回师，双方罢兵。中原政权第一次攻燕之役至此结束，结果后周尽取拒马河以南之地。

宋建国后，试图重新占领燕云十六州，但采取的是先南后北的策略，在消灭了南方的割据势力及北汉政权之后，宋太宗决定趁势北上，御驾亲征，收复幽燕。宋太平兴国四年(979，辽保宁十一年)六月二十三日，宋军直抵燕京城南，辽的汉族官员及平民纷纷降宋。但辽景宗及皇后萧绰(燕燕)派名将耶律休哥率五院军精骑3万人出山后闻道驰援，七月七日与耶律斜轸所率六院军分左右两翼夹攻宋军于燕京城北高粱河，宋军大败，宋太宗乘驴车逃走。

宋在高粱河之战失败后，并未放弃收复燕云的愿望，而一直积蓄力量，待势而动。雍熙三年(986，

辽统和四年)三月，宋又发动了第二次北伐。宋军分东、中、西三路北上，进展迅速。东路在曹彬率领下十三日攻下涿州，由于孤军深入，供给线过长，加之耶律休哥派小股精锐不断骚扰，宋军不得已退驻雄州。在宋太宗的督促下又第二次进军涿州，但耶律休哥层层设伏，宋军虽又攻下涿州，但实力大损，不得已二次退出。辽军全面反击，宋军大败。接着西线也溃败，名将杨业战死。辽取得了第三次燕京保卫战的胜利。

辽圣宗统和二十二年(1004，宋景德元年)，辽大军又南下侵入宋境内直至澶州(又称澶渊郡，今河南濮阳附近)，在城下遇到宋真宗亲率人军的顽强抵抗，双方势均力敌。在同年的十二月签定了史称“澶渊之盟”的和约。从此双方以白沟(今涿州南)为界，宋利用澶泊与白沟等河，筑堤贮水，扩大水田，以防契丹铁骑南下。之后百余年，宋辽基本和平相处，在经济、文化方面保持密切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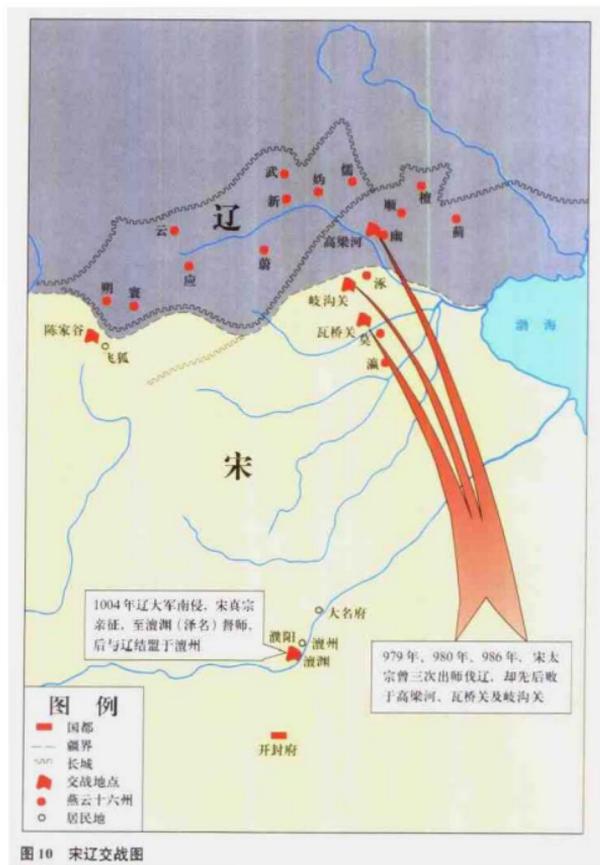


图10 宋辽交战图

第四章 汉族世家显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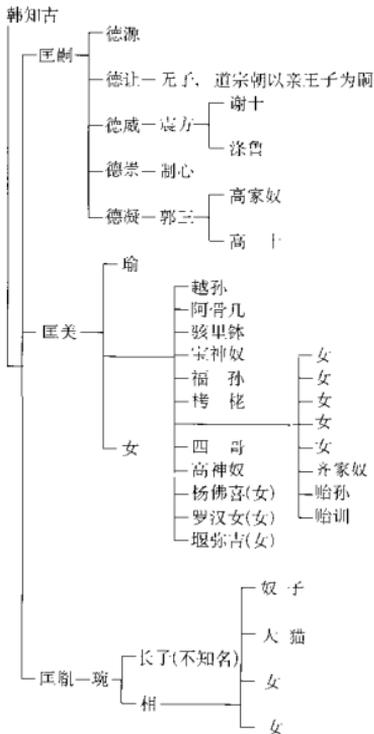
南京在辽代虽为五京之一，但是辽代皇帝仍沿袭着“四时纳钵”的制度，即随着四季变迁而游牧、田猎于不同的地区，政治中心也就随之迁移，只在冬季纳钵时才到南京，因此南京并不具备真正的都城意义。又由于契丹贵族大多须随皇帝迁移，因此南面朝官和幽燕地区州县官吏基本由汉人担任。在辽南京居住的人多为汉族世家显贵，这可从在北京发现的辽墓几乎全为汉人墓葬得到证实。韩、刘、马、赵等家族都是南京有名的世家豪族，他们为契丹统治者献计献策，辽的许多制度仍沿袭唐朝旧制。

第一节 韩氏家族

韩氏有两大家族，即韩知古—韩德让家族和韩延徽家族。韩知古是朔州玉田人，为辽太祖所俘，成为辽初重臣，为辽的建元立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其子韩匡胤曾官拜南京留守。而匡胤子德让在辽代更是声名显赫，深受景宗皇后萧绰的宠幸，官至宰相，被赐名为耶律隆运，列入皇族。他为圣宗(萧绰与景宗之子)朝的兴盛起了重要作用。

韩延徽也是辽初太祖耶律阿保机时代的功臣之一，他积极为阿保机出谋划策，在安置降辽汉人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他的家族墓地在今天八宝山附近韩家山，已发现有其孙韩伏及夫人合葬墓和六世孙韩资道墓。韩伏墓内出土的精美文物为研究南京汉族世家显贵的生活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韩知古家族世系表



韩延徽家族世系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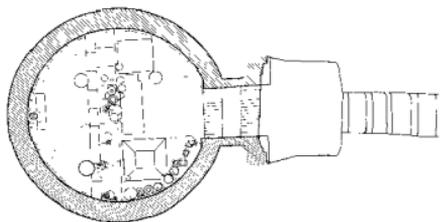


图11 韩伋墓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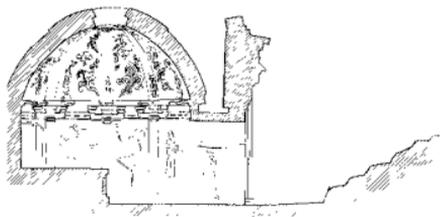


图12 韩伋墓剖面图 1981年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院内发掘，墓为圆形穹窿顶砖室墓，直径3.2米，葬于圣宗统和十二年(995) 墓内绘有壁画，出土瓷器、铜钱等40余件



图13 韩佚墓志拓片 从墓志中得知，韩佚是韩延徽之孙，以平州(今河北卢龙)节度使致仕。



图15 韩佚墓壁画 壁画在甬道和墓室中，均绘在白灰墙皮上，剥落严重。甬道壁绘一百吏。墓室北壁正中绘三扇花鸟围屏，内有两只麻雀和盛开的花朵。围屏两侧各绘一侍女，东侧侍女手捧托盘，西侧侍女正翘首眺望。墓室东、西两壁分别绘三幅画，每幅画有侍女一人，侍女若圆领宽袍，下束裙，脚穿皂鞋。东壁绘一手持琵琶、伫立桌旁的侍女，西壁为侍女沐浴更衣图，身后绘有衣箱、衣架。各幅中间绘花卉、飞鸟。墓顶正中绘莲花，墓顶四周分绘十二生肖人物。整个墓室绘画布局匀称合理，人物形象逼真，可惜因潮湿剥落严重，不能窥其全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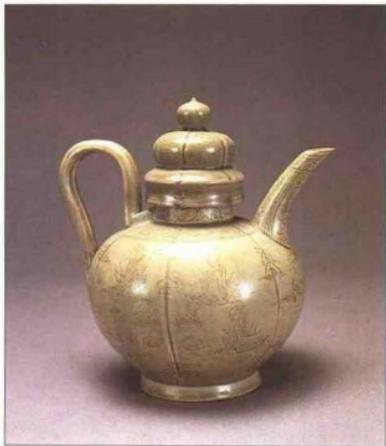


图14 越窑划花宴乐人物执壶 韩佚墓出土，通高18厘米，口径4.5厘米。越窑在今浙江余姚、慈溪、上虞一带，唐属越州，故名。唐、五代至宋初的越窑瓷器，由于胎质细腻，釉色莹润和刻画图案精美而负盛名。此壶盖呈塔式，壁有双孔，花瓣形直口，腹部为瓜棱状，器底刻“永”字款。盖饰云纹，把和流为卷草纹，腹部十题纹饰是八人宴饮图，席前陈有酒樽、果盘，巧妙地刻画宴饮的环境与气氛。不仅艺术价值极高，而且也反映了辽与南方的经济文化交流。

第二节 刘氏家族

刘氏家族在唐代一直在幽州为官，到辽代，刘景官至南京副留守。刘景子慎行，曾为北府宰相，监修国史。刘慎行有6子，达到了刘氏鼎盛时期。其中刘二徽娶圣宗第九女同昌公主，刘四端娶圣宗第十一女仁寿公主。刘六符在辽代政治生活中更是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在兴宗朝出使北宋，通过高超的外交艺术及政治斗争经验，借口索要关南十县之地，迫使宋每年增加岁币20万，为辽立下了卓越功勋而官拜宰相。

刘氏家族世系表



图17 十二生肖木俑 系柏木所刻，木俑头顶十二生肖，形象生动。



第三节 马氏家族

马氏家族虽然在宋人笔下有记载，但却不见载于《辽史》，而马直温夫妻合葬墓的发现却为寻找马氏家族提供了实物资料。出土的马直温妻张绍墓志提供了难得的史料。马直温本人生平并不显赫，但他的姻亲却都很有权势，夫人张绍为辽代名相张俭的孙女，而马直温的五个女儿又都嫁给皇族耶律氏及刘氏、李氏、张氏等汉家大族，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关系网。这也是辽南京汉族世家显贵的一个普遍特点。

图18 马直温墓平面图 这座墓位于大兴县西红门，为圆形砖室墓，葬于天祚帝天庆二年(1122)。出土的木质随葬品很有特色，其中有十二生肖像，另外有两件小雕男、女像。

